

Research on the County Magistrate Qu Yu'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ng and Ming Cultural Classics in Jianyang, China

Jiabin Wu

Guangzhou Panyu District Cultural Relics Bureau, Guangzhou, Guangdong, 5114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st years of Hongzhi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bookstore in Jianyang County was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fire; due to magistrate of a county Qu Yu is properly disposed after a disaster, the bookstore engraving industry gradually shifted from being keen on the marketing of contemporary tex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nd classic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bookstore in Jianyang County during the Jiajing period. solid foundation.

Keywords

Qu Yu; Jianyang County; publishing ancient books; calligraphy development

中国建阳知县区玉保护和发展宋明文化典籍的研究

吴嘉彬

广州市番禺区文物局, 中国·广东 广州 511400

摘要

中国明代弘治末年, 建阳县书坊受到火灾严重影响; 因知县区玉灾后措置合宜, 书坊刻业从热衷于时文的营销, 逐步转向文献典籍的发展, 为嘉靖年间建阳县书坊高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区玉; 建阳县; 刊行古籍; 书坊发展

1 引言

建阳县书坊刻书业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广泛的影响, 在明代嘉靖年间步入历史的鼎盛时期; 但在此前夕, 建阳县书坊有过一段衰败时期, 当地政府采取合理的措施, 带领建阳县崇化书坊步向正确的发展轨道, 避免了元季麻沙书坊的悲剧重现。

区玉, 字廷璋, 广东番禺人, 民籍。生于明成化元年(1465), 明弘治二年(1489)举人, 以监生参加弘治十五年(1502)会试, 会试第117名^[1], 殿试金榜三甲第112名同进士出身, 是明代番禺县第35位进士。

关于区玉的任职。在广东地区, 明代嘉靖四十年(1561)黄佐的《广东通志》、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郭裴的《广东通志》、清代乾隆二十三年(1758)《广州府志》, 均只记载任职知县。但是, 到清代道光二年(1822), 阮元《广东通志》记载: “区玉, 建宁知县。”另外, 同治十年

(1871)的《番禺县志》也记载: “区玉, 建甯(宁)知县。”笔者查阅了明、清年间的福建《建宁县志》均无明代区玉的任职记录。但在福建明代弘治和嘉靖两种《建阳县志》, 以及嘉靖《建宁府志》均能找到明弘治十五年, 番禺人, 区玉进士, 任建阳县知县时的记载。为此笔者确信明弘治十五年(1502), 区玉任福建建宁府建阳县知县事。明代知县的政务如《明史》的记载: “知县掌一县之政。凡赋役, 岁会实征, 十年造黄册, 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 役有力役、雇役、借债不时之役; ……岁歉, 则请于府若省蠲减之。凡养老……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 厥职而勤、慎焉。若山海泽藪之, 产足以资国用者, 则按籍而致贡。”

区玉在建阳知县任职期至正德三年(1508), 共7年。在任期间, 开展宋元文化的文献典籍保护和发展, 积极改善民生, 推动建阳县书坊刻业发展, 为建阳坊刻百年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 整顿明代弘治年间建阳书坊的时文

建阳县位于福建省建宁府, 唐代末年是全国茶叶贸易

【作者简介】吴嘉彬(1980-), 男, 中国广东佛山人, 本科, 文物博物初级职称, 从事明清文化史研究。

的集散地,良好的经济基础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两宋时期,福建、浙江、四川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建阳刻书业较快的发展,在南宋以后,宋代理学思想集大成者朱熹,在建阳讲学多年,并在崇化里建立同文书院以收藏书籍,当地读书风气浓厚,并提升了刻书业的发展。建阳出产刻书业所需的材料,(嘉靖)建阳县志记载:“纸,嫩竹为料,几有数品:曰筒纸、曰行移纸、曰书籍纸,出北洛里;曰黄白纸,出崇政里。墨,出兴中、崇泰二里。苦竹,可作纸。白眉竹,可作笔管。”另外还有梓树、梨树、枣树、银杏树等多种木材。由此建阳县逐渐发展成福建乃至全国的刻书中心。

明代,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坊刻业的利好政策,极大地推动其发展。如:①前明书皆可私刻;②书籍、笔墨均不收取商税;③书籍税民间逋负免征;④惟农具、书籍不鬻于市者勿算。明弘治三年(1490)刊行的《八闽通志》卷25《食货·土产·建宁府·货之属·书籍》称:“建阳县麻沙、崇化二坊旧具产书,号为图书之府。麻沙书坊元季毁,今书籍之行四方者,皆崇化书坊所刻者也。”

明代科举制度促进了建阳书坊的快速发展,明中期弘治年间,学风较明初浮躁,学子热衷时文,不能静心钻研经史。由此,书坊刊行时文,坊刻业进入一个迅速增长的时期。但这种只为科举而编辑的八股揣摩时文,只是进入明士大夫阶层的“敲门砖”,绝大部分都没有学术、欣赏价值的书籍,是官方不能容忍的。弘治四年(1491),国子监祭酒谢铎向明孝宗的奏疏指出:“今科举者,虽可以得豪杰非常之士,而虚浮躁竞之习亦莫此为甚。今而不读《京华日钞》,则读《主意》;不读《源流至论》,则读《提纲》;甚至不知经史为何书……臣愚乞敕提学官,凡此等书,其板在书坊者必聚而焚之,以永绝其根柢;其书在民间者必禁而绝之,以悉投于水火。”谢铎议在书坊烧时文刻版等事项,执行力不佳。弘治十一年(1498),河南按察副使车玺向明孝宗上奏,明确指出:“《日钞》之书未去,又益之以《定规》《模范》《拔萃》《文髓》《文机》《文衡》《主意》之书未革去;又益之以《青钱》《锦囊》《存录》《活套》《选玉》《贯义》纷纷杂出,由禁之未尽其要也。乞敕福建提督学校官亲诣书坊,搜书版尽烧之。”两位教育主官的要求终于在弘治十二年(1499)得到实现,当年建阳书坊受到火灾毁灭性打击,明代中央政府借机对建阳书坊进行整顿。据《明实录明孝宗实录》记载:

“弘治十二年(1499),吏科给事中许天锡言,福建建阳县书坊被火,古今书版荡为灰烬……自中秘所藏与经主学士所共习者,通前存编刚定部帙,颁下布政司给与刊行。仍乞敕所司,推翰林院或文臣中素有学识官员,令其往提调考校……礼部覆奏谓建阳书板中间固有荡无留遗者,亦容或有全存、半存者,请令巡按、提学等官逐一查勘。先将经传子史等书及圣朝颁降制书一一对正,全存者照旧印行,半存及无存者用旧翻刊,务令文字真正,毋承讹习舛,以误来学。”

明代建阳的支柱产业,书坊刻业毁灭性打击后,是

整顿时文一个好时机。弘治十五年(1502),明政府考虑区玉作为政治新人,并不是官宦世家,会试、殿试名次较后,没有政治背景,是能实现明代儒者们要求的一个理想人选。当时建阳学者袁钰称:“东广番禺区公,牛刀小试,剗繁治剧。”而区玉在任期间,建阳基本没有时文刊行;并能按要求以重刊传统的经史子集,促进建阳书坊刻业发展。方彦寿《建阳刻书史》称:“许天锡要求把书坊为科举考试而编印的“伪学”书籍晚宋文字和《京华日钞》《论范》《论草》《策略》《策海》《文髓》《讲章》《文衡》《主意》之类……不正书版,悉用烧除;许氏奏言提到的这些书,现在没有一种流传下来。”^[2]

3 编辑建阳县志、刊行古籍是区玉促进建阳书坊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措施

建阳县作为明代重要的印刷中心,恢复灾后书坊刻业的发展,同时实施明代儒者对时文的压制,成为区玉重要任务。

3.1 主持编修和刊刻《建阳县志》(弘治)

明景泰元年(1450),尹载鲁(云南太和人,1445年以监生知县事)刻印、黄璿(建阳人,由监生任直隶霸州判官)纂《建阳县志》4卷、《杂志》3卷,为建阳始修县志。此书原刻本久佚,现天一阁所存为明弘治十七年(1504),区玉重刻本残帙6卷,其中袁钰、赵文所纂《续志》1卷。

其中,朱熹十一世孙、(嘉靖)《建阳县志》的总裁朱凌在《建阳县志·序》明确指出:“史法胥,悖志无足徵焉;赖多文献,风犹可想也,旧志既毁;弘治间区君廷璋氏,一尝梓之。见赵左史(赵文)序矣,阅岁浸久,廓而增之。”

区玉对赵文说:“予生斯长斯,而又粗知数量,猥以前序见囑,并以凡令政有可取,或遗之而未载,或载之而未悉者,皆得,以备及之。”这里可以看到区玉资治、存史、教化的思想。

区玉治理下,建阳书坊刻业逐渐走出困境。《建阳县志·续志》(弘治)主旨是:自弘治十二年(1499)建阳书坊刻业火灾后,至明弘治十七年(1504)建阳书坊刻业灾后重建的成果。是区玉向明中央政府工作汇报,也是代建阳书坊刻业向全国各地书商发布的公告,宣布:“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书坊,目具在可考也。”

其中科举官版书刻,明成化以前“制书”25种:“太祖皇帝:《大诰》3篇,《武臣大诰》1卷,《洪武礼制》1卷,《礼仪定式》1卷,《大明律》30卷,《大明令》1卷,《诸司职掌》9卷,《孝慈录》1卷,《洪武正韵》16卷,《教民榜》;太宗皇帝:《易经大全》24卷,《书经大全》11卷,《诗经大全》20卷,《春秋大全》37卷,《礼记大全》30卷,《大学大全》1卷,《论语大全》20卷,《孟子大全》14卷,《中庸大全》1卷,《性理大全》70卷,《为善阴鹭》10卷,《孝顺事实》10卷;仁孝皇后:《劝善书》20卷;宣宗皇帝:

《五伦书》62卷；宪宗皇帝：《续资治通鉴纲目》27卷。”

另存板尚有经书19种，史书15种、诸子18种、诸集48种，杂书（含类书、医书）37种，合共137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区玉仍称：“好古而有力者，能搜访、订正，而重刻之以惠后学亦一幸也。”

因仍有11种典籍没有能刻板：《南史》80卷（今板毁），《北史》100卷（今板毁），《辽史》116卷（板毁），《金史》135卷（板毁），《文章正印》80卷宋刘震孙编（缺），《万宝诗山》35卷（缺），《诗宗群玉府》30卷毛直方编（缺），唐宋《诗林万选》15卷宋何新之编选（缺），《唐诗粹》12卷刘斌编注（板不存），《中州诗集》18卷《乐府》1卷元元好问辑（板不存），《类说》50卷宋曾慥编（板不存）。

另外有2种典籍残缺：《元朝风雅》30卷蒋易编集（缺多），《刘静修文集》22卷刘因撰（缺多）^[1]。

对此区玉并没有把残缺板的问题，简单地推诿到明弘治十二年的那场火灾事故；而是跟袁钰、赵文从多个角度分析问题的原委：“①近时学者，自一经四书外，皆度阁不用，故板刻日就脱落；②书坊之人，苟图财利；③官府，征索不酬劳，往往阴毁之，以便己私，殊不可既叹。”

区玉以重新刊行科举用书的方式压制时文，为学子们提供良好的学术氛围，为书坊指明了未来发展方向。精心布局下建阳县崇化里的书市位于出产书籍纸的北洛里南向，在出产墨的兴中里、崇泰里西北向，区域内形成完整产业链，建阳县书坊已逐渐恢复往日的生产力。明正德年间之前，科举应试书籍几乎皆出于建阳书坊，刻本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类书及医书为主。《建阳县志》（嘉靖）记载：“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

3.2 重刊《事文类聚》共220卷

《事文类聚》是一部宋元时代的类书，南宋的祝穆编成了前集60卷、后集50卷、续集28卷、别集32卷，元代的富大用续编了新集36卷、外集15卷，祝渊续编了遗集15卷，七集共计236卷。祝穆姑奶奶是朱熹的母亲，年少时祝穆在建阳随朱熹读书。《事文类聚》的书目收录在《建阳县志》（弘治）的典籍，杂书目录中：“《事文类聚》共220卷，原板缺；弘治十七年，知县区玉重刊。”作为建阳本地创作的优秀类书，是本土优质的文化资源。在原刻板缺失，文献传播出现障碍的时期，区玉能及时做好重刊、推广工作，是保护和发展宋元文化历史文献的重要举措。

历代对《事文类聚》的评价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认为优点是编排“条列件系，颇为赅备”。其他类书“所收古人著作，大抵删摘不完，独是书所载，必举全文。故前贤遗佚之篇，间有藉以足征者”，“在宋代类书中，固犹为可资检阅者矣”。《适园藏书志》卷四五还曾著录有弘治十七年（1504）刻本，有区玉的识语（张钧衡藏书后归中央图书馆，然中央图书馆书目未见著录，是书下落不明）^[4]。

3.3 刊行《群书考索》

明刘氏慎独斋刊刻《群书考索》，《群书考索》卷首题“建阳知县区玉刊行”此书为建阳县治委付刘氏所刻，此书的书板归建阳县治所有。在明《建阳县志·梓书》（万历）《县治书板》条下列有此书名，且标注无板，说明在明万历年间建阳县已此书的版片。

宋人章如愚编纂《群书考索》是一套百科全书，章如愚字俊卿，号山堂，浙江金华人。章氏自幼聪颖而富有才气，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进士，官国子博士。归乡后，结草堂山中，与士子讲学，时称山堂先生。所以《群书考索》又名《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或《山堂考索》，本书共有四集，《前集》66卷，《后集》65卷，《续集》56卷，《别集》25卷，共212卷。明正德年间刻。其中书前郑京序，记叙建阳知县区玉，福建按察司金事院宾托建阳书坊主刘洪刊刻此书情况：

“《山堂考索》一书，乃宋儒章公俊卿之所编集，板行于世间，被回禄，失传久矣。文献故家或有存者，又秘之，以为己宝。乃者吾闽金事院宾巡历抵建阳，手出是书以示邑宰区玉曰：“是书大而天文地理之幽赜，君道臣道之宏远，经史礼乐之渊懿，以至兵刑制置财用盈缩，官制边防沿革，靡不深探本源，具载无遗。兹欲绣梓以广其传。然功用浩大亥豕谬讹，非得涉猎古今，且裕于资本者莫堪是任。子于书林可得若人以供是役否？”区退而商诸义士刘君洪曰：“非子莫克胜是任者。”刘曰：“唯唯。”区遂以刘应命。二守胡公瑛、通府程公宽、推府马公敬闻而趣之，金以白诸新守费公愚，乃蒙叹赏，各捐俸金以资顾直。且因区宰初意，复刘徭役一年以赏其劳。刘自领命以来，与诸儒颀，校仇维谨，鸠工督责，两越春秋，始克成书。”

《群书考索》自此以后无人重刻，流传很有限。收录在嘉庆《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17“明版子部”：《群书考索》三函，32册。胡玉缙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山堂考索》是明刘氏慎独斋本^[5]。

李伟国的《〈山堂考索〉的作者和版本》称：此书卷帙浩繁，材料丰富，经其查对研究，可知章氏引述群籍，甚为忠实，不轻易作删并改动，且多注明出处，在校勘和辑录古籍方面用处很大。

建本特点是品种多、价格低廉，其读者普遍为全国大部分中下层民众，建本的发展能助力文化知识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其中刊行《事文类聚》《群书考索》两部类书，使人们对知识的学习、整理、运用、传播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

4 多措并举治理建阳，推动坊刻业发展

明弘治末年，建阳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混乱，财赋、狱讼等问题突出，社会需要安抚。

4.1 理顺政务是区玉治理建阳重要举措

建阳素号剧邑，区玉就任建阳知县后，刚好是十年造

黄册之年,黄册是财赋征收重要指引。同时,火灾后的商业纠纷、民商诉讼大幅增加,但经过区玉一年的治理,已政通人和,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建阳学者袁钰称:

“弘治癸亥,东广番禺区公,以名进士来宰是邑,达邑多事。缘近年数易长官,奸毙百出,财赋之违纳,狱讼之淹滞,不可胜计,兼值重编籍,讼谋无虚日,邑称难治。此其时乎,区公,牛刀小试,剴繁治剧,日渐就绪,未几一岁,赋足,讼平化洽,民安始得。”

4.2 完善社会救助,加强税务、交通、治安等基础设施建设,多措并举提升建阳营商环境

建阳学者赵文赞区玉“公明廉威实有之矣”。灾后救济和城市修缮,能提升地区效能。据两种《建阳县志》(弘治)和《建阳县志》(嘉靖)所载,完成的基建设施有:①重建税课局。明史记载:“税课局,大使一人,从九品,典税事。凡商贾、侖屠、杂市,皆有常征,以时榷而输其于府若县。”②明弘治甲子年(1504),重建两所养济院。一所在景肃门外,西观右去百步,许收鰥寡孤独、痲瘓残疾者;一所在均亭里樟湍之上,地名溪口之湾,坐东面西,下瞰湍头三石。收养痲子于此,内祀观音像。古称地灵,其中患痲者年愈一人是其验也。③均亭里重修石桥,区玉奖“惠民桥”的牌匾。④明正德二年(1507),重修建阳递运所。明史记载:“递运所,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掌运递粮物。”建阳递运所位于三贵里,设有红船50只,水夫500名,防夫30名。演武亭,正德年间,知县区玉建,当时建阳县兵防主要由民快250名,油岭隘兵100名,三盘隘兵100名等组成。

4.3 书坊的发展

顾炎武在《钞书自序》指出:“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及有刻板。”建阳的社会经济和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坊刻业也得到实质性发展,优秀书坊开展营运,为建阳书坊带来新活力。林柳的硕士学位论文《明代中期建阳书坊刻本研究》所载:“正德元年(1506)建阳郑氏刻书有刊刻,正德二年(1507)建阳杨氏刻书也有刊刻。”这是明代有一定名气的建阳坊刻。据官文娟的硕士学位论文《明代建阳书坊的科考用书》的数据:郑氏书坊刻书数量95种,占明代建阳刻书8.42%,排名第4位;杨氏书坊

刻书数量75种,占明代建阳刻书6.65%,排名第5位;另外从其《明代建阳书坊刊刻科考用书的统计分析表》,弘治年间、正德年间的建阳科考用书,分别在明代排第4位和第5位。

高施的硕士学位论文《建本医书刊刻及其影响研究》称,正德年间建阳刊刻医书的种类,迅速恢复到成化年间的数量,约为明代第5位。上述数据反映建阳书坊已从火灾后走出困境,并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正德年间,戚继光诗句“咫尺书林应万户,倚空文焰欲腾腾”形容建阳书坊的繁盛。

为此看出区玉治理建阳期间方法得当、措施有力,明正德年间建阳已进入平稳的发展。林拓的《福建刻书业与区域文化格局关系的研究》经统计分析后指出:“明代建阳坊刻于成化至正德年间有所发展。”^[6]

建阳坊刻业从明弘治末年因火灾书板荡无留,至正德年间有所发展,区玉为嘉靖年间快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张秀民《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指出明代建阳出版总数占全国出版首位,建宁84家书坊,绝大部分在建阳县。

雅重斯文、垂情典籍书林古典的区玉,以改善民生和营商环境,推动建阳书坊刊刻文献典籍的风气;使建阳书坊刻业进入了一百多年快速发展时期,成为明代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5 结语

现今种类繁多明代建本,保存在各地图书馆,为广大学者研究宋明文化,提供宝贵的文献典籍。由此可见在建阳知县区玉对宋明文化的文献典籍保护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明]明代进士登科录[O].弘治十五年进士登科录一卷.
- [2] 方彦寿.建阳刻书史[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
- [3] 区玉.(弘治)建阳县志[O].县志续集.
- [4] 沈乃文.《事文类聚》的成书与版本[J].文献,2004(7):162-174.
- [5] 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 [6] 林拓.福建刻书业与区域文化格局关系的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7):3.